

传教士对中国西南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考察

——以《华西教会新闻》为中心

白 晓 云

提 要：《华西教会新闻》(1889—1943)是由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新教差会主办的英文月刊，曾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西南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民间信仰等内容，使各地传教士和西方读者由此了解到中国西南的宗教信仰，也为西南宗教史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史料。本文以这些文章为基础，考察传教士群体对中国宗教信仰的理解，并分析其研究视角与立场。

白晓云，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四川绵阳师范学院教师。

关键词：传教士 《华西教会新闻》 中国西南 宗教 民间信仰

西方传教士入华后，始终将文字出版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期刊则是文字传教的主要载体之一。传教士出版的期刊，从受众来看，可分为两类，一类面向广大中国民众进行耳濡目染的教化，从而达到宣传基督教的目的；另一类面向传教士本身，作为交流信息、讨论问题的平台，从而推进传教工作。前一类刊物很多，不一一列举。后一类刊物中，创办于上海的英文《教务杂志》是佼佼者，学界对其研究已有许多；而另一份先后在重庆和成都发行的英文《华西教会新闻》，过去却“甚少被学术界利用”^①。笔者经过浏览《华西教会新闻》(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各期，发现该刊除了交流教务信息和讨论传教政策外，还有许多文章涉及传教士对中国西南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认识，这意味着东西方宗教的接触与联系，故打算对此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试图选取《华西教会新闻》中关于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文章，从中梳理出传教士群体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勾勒其在研究中国宗教信仰时的关注焦点与理解视角。这是基于如下考虑：其一，基督教要在中国这个异邦土地上扎根发展，其意识形态上的首要对手是对中国人影响巨大的“释”“儒”“道”等宗教；其二，中国民风民俗中体现的信仰观念也与基督教的教义大相径庭。这些文章真切地表达了传教士在面对异质宗教信仰时的认知与态度，是中西方宗教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一种方式；同时，在这些文章中所保存的有关西南宗教信仰的信息，是今日研究西南地区宗教史的珍贵资料，值得介绍给有兴趣的读者。

一、对佛教信仰的认识

清末民初，西南地区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大佛教体系。汉传佛教是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后而成，而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与藏区文化融和而成的产物。两者在教义教理上各有不同，再加上所在地地理、气候、

民族、建筑、饮食等差异，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差别很大。在《华西教会新闻》中，传教士将汉传佛教称为“佛教”，将藏传佛教称为“喇嘛教”，分别对两者都有一定的观察和研究。

(一) 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在中国社会中有重要地位，传教士群体对西南地区的崇佛现象和佛教理论非常关注。他们注意到与佛教寺院相关的种种名称与传说。傅士德(Clarence L. Foster)在《峨眉山旅游路线》中插录了从峨眉山山顶的“万佛寺”、“千佛顶”、“西瓦殿”直到山脚下的“大峨寺”、“肖店子”共41座寺院的中英文名称。^②白思德(Beulah Bassett)的《嘉定大佛》则描写了传说中一位从杭州西山到峨眉山朝圣的佛教徒在劳累至极，靠在山凹处休息，形成今日的乐山大佛的故事。同一篇文章还记录了关于乾隆年间，一位逃到大佛耳朵避难的人喊着要饭，却被人们误以为是大佛开口说话的故事。^③这两则传说，传教士只是客观地记录所闻，并没有对其评价。他们对佛教传说的真切看法表达在《金顶上的巨龙》一文中。文章作者在峨眉山登山时，听到一位男童所说，在峡谷下面遥遥可见的庙旁的水塘里有一条龙。传教士认为这是“又一个要去调查的迷信”，于是在庙宇周围寻找，向水塘扔石头，但没有找到那条传说中的龙。当他们往山上走时，根据遇到的一位佛教法师的描述，用水描在地上模拟龙的大小和外形，认为其显出来不过是蜥蜴而已。传教士评道：“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有这样的龙！是的，成千上万条。”在这位传教士看来，人们相信这个传说只不过表明“中国人的轻信，且更显示出今日佛教之无意义。在诗样的想象中追溯古老的伟大的乔达摩是美的……但如果这样一个明目张胆的假话成为今日佛教徒来招徕人们到金顶的广告之一，那么这就肯定只能意味着佛教早已达到其目标，其完全虚空的涅槃。”^④作者字里行间的讽刺，表达出对佛教的轻蔑，其对巨龙实为

蜥蜴的论证和对佛教涅槃思想的反讽,不仅是对巨龙存在这一事实的否定,而且通过这一否定贬低佛教,并唤起基督徒读者对佛教的荒谬之共鸣。

除了佛教传说,佛教的典礼仪式也是传教士细致观察的对象。成都著名的佛教寺院文殊院曾举行过多次法会和仪式。受邀出席的传教士详细地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陆德礼(A. F. Lutley)的文章《文殊院的特别仪式》细致地描述了文殊院在 1931 年举行的一次西南和平法会的整个典礼过程。整个仪式包括诵经、反复念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等程序。他的感受是,“在普通百姓当中举行这样的仪式,通过其独特的音乐、香和诵经产生了半催眠性质的感觉,是在与神秘力量面对面时的一种神秘和不祥的感觉”。对佛教的思想,他认为,因为“上帝将自己显示给寻找他的灵魂,那照亮每个人的光也会被佛教徒隐约看到,因此佛教也有某些伟大的真理”。同时,这真理“在文学中比起流行的仪式中更清楚可见,大量的迷信仪式已经覆盖了佛教的最初教义”^⑤。另一篇文章《佛教剃度仪式》也记录了一位传教士参加在文殊院举行的一次佛教剃度典礼的详细经过。对于那些能忍受在头皮烧香疤的受戒仪式的人,作者认为,除了几天没有休息之外,他们可能还服食了某种强力的麻醉剂来帮助减轻痛苦。对于这些完成剃度受戒仪式的人,作者评道:“他们完成了仪式,内心的欲望和渴望得到了满足。他们是否找到了更大的平静,更深的开悟?”^⑥显然,作者对通过皈依佛门来获取内心平静的方法是有所怀疑的。

(二) 藏传佛教

《华西教会新闻》中涉及藏传佛教的文章,其论述者主要是生活在打箭炉(今康定)、甘孜、巴塘等地的传教士。他们发现这里的藏传佛教具有独特之处,将其称为“喇嘛教”,并对这一特有的宗教现象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观察和描述。

罗伯特·柯宁汉(Robert Cunningham)以 Tibetan 为笔名发表《祷告、僧侣和朝圣》一文,从藏人的祷告、藏传佛教的派别、藏族僧侣的等级、藏族的驱魔仪式等四个方面介绍了其对藏传佛教的观察。他还特别提到藏传佛教对信徒信仰的专一性要求阻碍了基督教传播。“喇嘛教是本土宗教,每家每户都在喇嘛庙有自己的代表。反之亦然,如果喇嘛改信基督教,他不仅会被喇嘛庙还会被其家庭所排斥。这种经历在藏区这样人烟稀少的地区是不可思议的。而想既保有基督徒身份又留在喇嘛庙中则不可能。罗马天主教经过 50 年的在西藏边境的艰苦努力,都无法使一个喇嘛改信基督教。”^⑦

他在《喇嘛》一文中对藏族僧侣做了进一步研究,指出“喇嘛”代表“我是最高的,在我之上没有最高”之意,并细分了这个词在藏人心中所指的不同类别的藏族僧侣。他还进一步对喇嘛群体期望成为活佛、避免进入十八层地狱、进入纯粹神圣的极乐世界的这三重欲望及其实现方式做了介绍。^⑧

罗伯特还在《华西教会新闻》41 卷第 11 期发表了一篇名为《后门》的文章,专门研究了喇嘛,并论证了“喇嘛”和“牧师”两个术语不具有对等性的观点。他首先介绍了每个喇嘛都有专属自己的在疾病或紧急时刻可呼求的神,这神每日与他同在。喇嘛将力量分为善恶两

种,认为疾病不是病,而是邪恶力量的攻击。作者说,喇嘛总是在邪恶力量和头脑简单的牧民之间,通过摧毁邪恶力量为生病的牧民和牛治病。罗伯特毫不掩饰其对喇嘛治病和敛财行为的反对。他举了一例,某个喇嘛发现某个生病的牧民没有向他缴纳奉献时,会在该牧民的帐篷周围撒上牛痘细菌;这样病人去世,喇嘛庙则没收了其财富。接着,他介绍了喇嘛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指出,“喇”意为灵魂或生命,“嘛”意为母亲,“喇嘛”就意为“生命母亲,宇宙的常存的母亲”。在藏传佛教中,喇嘛比一切事物都高,神的存在取决于他,他在神之前;喇嘛无罪,因其不属于世界,而罪是世界的。因此,喇嘛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他还指出,喇嘛不能杀死羊或小鸽子,呈给神作罪的献祭,在这点上与犹太人的牧师不同。最后,他介绍了不撒谎,不偷盗,不结婚,不杀生等四种喇嘛需遵守的最重要的行为规范。^⑨

除了罗伯特以外,另一位传教士叶长青(J. H. Edgar)也对藏传佛教有所描述。在《藏区尼庵和觉姆》一文中,他讲述了探访一处与世隔绝的尼庵,并带去基督教书籍的经历。^⑩他的另一篇文章《佛和菩萨》则描述了“佛陀”这一概念复杂的发展过程,和不同派别以不同的名称命名自己的佛等情况。^⑪在叶长青看来,要理解藏传佛教,需从地理、气候和历史语境入手。他在《喇嘛教》一文中指出,藏区纬度较高、天气多变,藏区的人们于是设计一些观念性的保护性机制来对抗不友好的灵性世界;同时,藏区移民较多、语言各异,藏传佛教则提供了一套统一的系统构筑起凝聚力将这里的人们团结成一个民族。^⑫

贝尔(N. H. Bare)发表在《华西教会新闻》第 33 卷第 10 期的文章《四川边境的祈雨》描述了在长期大旱之后,藏传佛教信众群体敬拜雨神没有换回雨水,但一位高级的藏族僧侣到一个神庙朝圣的第二天就天降暴雨的故事,于是信徒将祈得下雨归功于他。^⑬

此外,传教士还对藏传佛教影响下藏区疾病丧葬的独特行为方式进行了研究。哈迪(Nina Palmer Hardy)发表在《华西教会新闻》25 卷第 10 期的文章《藏区的疾病和死亡风俗》描述了藏人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方式。如,人们认为导致疾病的恶魔在糌粑里,为防止疾病,就做糌粑分给街上的狗吃,认为疾病会被狗吃掉;人们认为他人进入病人家里会带来邪灵,于是在病人家门口放岩石和灰作为信号;又认为恶魔就会趁病人睡着之时主宰病人,于是用木棒敲击或针刺病人的头以防止其睡着;当喇嘛和家人认为病人没有希望活下来时,喇嘛就举行安葬仪式,包括祷告、撒古字和圣水在病人身上。哈迪非常反对这种疾病观念和治病行为。他认为,在藏区,病得很重是一种折磨,“不是给予安静的环境和经验丰富和体贴的人来照料,而是那些为去除产生恶魔的疾病的铜钹声、鼓声、喇叭和单调的祷告声、喇嘛的咒语。如果疾病本没有严重到使人丧生,这样的治疗则一定会”^⑭。罗伯特·柯宁汉描述,藏区的人们将疾病归咎于邪灵,在喇嘛看来,治病就是要打败这股有害的力量。^⑮

一位名为 M. K. N. 的传教士在《华西教会新闻》12 卷第 10 期发表的文章《医药工作作为进入藏区的手段的价值》则介绍了喇嘛用草药、放血疗救乃至灵性治疗病人身体疾病的方法。对这种治疗疾病的方法, M.

K. N 显然不赞同。他肯定了现代医药的作用,认为那些将疫苗引入西藏的传教士“能够在藏人心中与达赖喇嘛媲美”,同时从宗教传播的立场乐观地认为疫苗的引进能帮助基督教在藏区的传播,是“喇嘛教衰落的信号,是基督宗教在这些不信神的部落中建立的信号”^⑦。

二、对民间信仰的考察

传教士还对西南地区的“风水”、“占卜”、“算命”、“巫术”和其他民间风俗的信仰因子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描述。

斐焕章(J. Vale)在1910年到1911年间发表连载文章《占卜、算命和巫术》描述相关内容。在《华西教会新闻》第12卷第8期到11期,他对占卜的历史、中国历代占卜家及其占卜手法做了简短介绍。第8期中,他从中国学问分为道学、理学、数学和科学四类谈起,详细地介绍了其中研究阴阳五行、人的命运的数学,并进一步介绍占卦,认为八卦起源于伏羲,周文王将之阐明成为《易经》一书。在第9期他介绍了周朝的宫廷占卜者阳处父、战国时期的鬼谷子和汉代严君平、郭璞、管辂等人。在第10期,他介绍了三国时期的庞士元、唐代的袁天罡和李淳风、宋代邵康节、元代刘伯温。在第11期,他介绍了明代的程智士。从《华西教会新闻》第12期起,斐焕章陆续介绍算命相关内容。他指出,“算命”这一名称来源不可知,在宋元以后的小说中才开始出现。算命者将这一方法追溯到诸葛亮和刘伯温,也有人追溯到姜子牙。文中还讲述了姜子牙的一次驱魔的故事。斐焕章将算命方法分为两类。在《华西教会新闻》第13卷第1期中,他介绍的是拆字的算命方法,并给出例子阐述。在同卷第2期,他介绍了普通算命方法中的“土母经”、“八子”和“考时候”三种方法。第3期中,他还介绍了“改歹命”、“铁板数”和“紫微数”三种算命方法。作者指出,除了“紫微数”外,算命者一般只是用这些方法中的一种。这些算命方法为第一大类普通算命方法。之后,他介绍了第二大类算命方法。在13卷第3期中他介绍的是“玄关”。第4期中,他介绍了“奖老夸少骂中年”、“响刚”、“犁铧经”等方法。^⑧到此为止,斐焕章解释了中国民间的占卜和算命,而“巫术”的相关内容,则要等到1913年《华西教会新闻》第15卷第8期才开始论述。

在《华西教会新闻》15卷第8期和16卷第2期和第3期,斐焕章发表了连载文章《巫术》。在第一篇文章中,他首先区分了占卜者、算命者和术士。他认为,占卜者代表神说话,是神的直接媒介;算命者和术士则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进行预测,要取悦顾客;同时,占卜者和术士是到处游走,不会冒险在任何地方常驻。接着,他举例介绍了术士使用的专门术语,如将硬币称为“把”,将从1到10这十个数字分别称为“流、引、则、中、胜、止、受、足”等。在16卷第2期的文章中,他将术士的手法分为两大类:“更特别的方法”和“还要特别的方法”。前者包括“假装邪术”、“诡秘法”、“包得功名”等方法。在《华西教会新闻》16卷第3期的文章中,他将使用“还要特别的方法”的术士又为两类,“四大江湖”和“四大门头”。“四大江湖”分为“惊”、“培”、“飘”、“测”,“四大门头”分为“风”、“火”、

“爵”、“耀”。作者对“风门”的手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⑨根据《华西教会新闻》目录,斐焕章在第16卷第8期继续介绍了术士的相关手法,可惜原文佚失。

就占卜、算命和巫术的介绍内容来看,这些民间信仰中的要素,被道教吸纳,成为道教的一部分。虽然斐焕章没有在这一方面再深入挖掘,但他对这一主题的把握,既有纵向的历史视野,也有横向的现状描述,有其可取之处。

此外,斐焕章还在《华西教会新闻》13卷第2期以《姜子牙》为题,从《封神演义》中摘译出姜子牙以灵验的占卜者的身份得名声,又因火烧琵琶精而获得商纣王赏识而得到官职的故事。作者将《封神演义》与道教相联系,认为“我们虽不能从《封神演义》这本书中找到道教最好的教导,但众所周知的是,普通人中盛行的许多观点都是基于这本书和它对应的佛教书籍《西游记》。而且,这些宗教中的许多英雄和神是这本书的主要角色”^⑩。将《封神演义》与道教信仰、《西游记》与佛教信仰关联理解,是传教士对中国宗教研究的重大突破,对这两本著作与宗教关系的研究,直到今日还有学者在进行。

斐焕章还在《华西教会新闻》7卷第4期的《中秋节和天后崇拜》讲述了关于中秋节、太阳和月亮的传说,也指出了各省有不同的祭月亮的习俗。他认为,中秋节源于贞观年间,皇帝给参加考试的学生蛋糕,让其带回家吃,也作为给先祖的贡品,后来,这种进贡先祖的行为逐渐演化成了向月亮进贡蛋糕的风俗。在斐焕章看来,这种风俗体现的是偶像崇拜。^⑪

文藻(Thos Windsor)在《华西教会新闻》第7卷第10期发表文章《奇怪的现象》,记载了他所在之处的地方官家里多次失火,却找不到原因,而请道士驱魔也无效,家中继续起火的故事。有人认为是这位地方官错杀无辜,而其他入将之归因于地方官触犯了狐仙。文藻并不同意将之归结于“魔”或狐仙。他认为,这些都只是人的推测;要找出起火的原因,需要由比人更高的力量。^⑫他没有明确指出“比人更高的力量”是什么,但依据其基督教的背景,这一力量显然是“上帝”。

三、传教士考察活动与观点评析

从内容来看,《华西教会新闻》中的这些文章,涵盖了西南地区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许多方面。传教士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传说、祈祷仪式、剃度典礼、僧侣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他们还注意到中国其他民间信仰的独特之处,以大量笔墨叙述了其历史渊源和现实情况。这些文章,既有传教士对现象的主观认识,也记录了被观察方的声音,代表了传教士对西南地区宗教研究的部分成果。

从研究方法与态度来看,以传教士为主流写作群体的《华西教会新闻》对宗教信仰的研究,其写作主题与论述基调受到基督教立场的影响。他们在基督教优越感的基础上来审视中国宗教的价值,在中西宗教的比较中有意地突显基督教的优越性。启尔德(O. L. Kilborn)在《华西教会新闻》9卷第9期的社论《中国的唯一希望》中通过对伊斯兰教不可变通、暴力的神,佛教和道教的神是人们在怀疑和困难时以礼物和诺言欺骗的对象,儒家以伦理体系为重而仅仅传播了似是而非的信息的阐

述,来得出基督教是最好的最美宗教的结论。^③以基督教观念作为评判的标准与框架来定位其他宗教的方法,显然有失偏颇。启真道(L. G. Kilborn)发表在《华西教会新闻》41卷第6期的文章则通过对比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如何影响人们生命的最高追求,得出了基督教的生命观最优越,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人生命更具活力的结论。他认为,佛教将保存生命的欲望看作万恶的根源,因此将涅槃、欲望的减灭和自我完全化入空虚看作人类的最高目标;而老子则教导个人在与自然法则的对抗中的无望,认为奋斗无用,人类的最高智慧和责任是寻找自然法则并顺应其生活;基督教思想中,个人在意志、目的和行动方面与上帝的统一则能使所有个人潜能得到释放,并积极参与生活。在他看来,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下,人的自我没有得到尊重,人生消极;但基督教的思想则使人类有了积极的新的生命。^④他只看到了佛教和老子的思想产生的消极影响,但没认识到这种看似消极的行为背后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种和谐其实也是对自己、他人、世界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和行动。造成这种偏见、误解的根源还在于传教士们所持有的基督教立场使他们在对待异质文化时产生骄傲与偏见。

从文章作者的身份来看,对中国宗教与信仰的研究体现了他们的双重身份:一是学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相对客观地观察、认识和理解;一是传教士,以福音传播为根本目的,强调理解基础上对中国人信仰模式的改变。当传教士以新鲜好奇的心态来观察中国西南宗教信仰的独特之处时,他们比较忠实全面地将各种现象记录下来,如对一些民间传说、宗教礼仪的描述,显示了他们作为学者,在尽量保存所能得到的信息方面的努力。但相比而言,传教士的身份与任务对他们有更强烈的影响。他们对西南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观察与记录本身,就是其作为传教士要在与基督教相异的文化中传播基督教并使之扎根在这陌生土地中所要首先开展的工作之一。没有对他人的理解,就无法找到影响他人思想的方法。同时,传教士在其文章中塑造了一种观念,即中国宗教的落后性,中国人需要更正确更高明的真理基督教来引导,以此激发其他传教士的使命感,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基督教传播的方法探讨和实践当中。正如周忠信所言,对于那些故事,“有些人可能觉得可笑,一笑了之耸耸肩而已。但对传教士来说,他们必须发掘出更深层的东西。它们是伟大的人们对最深的奥迷,人的命运的探索;是对来世与现世、当下的关系的探索。就这点而论,我们细心地、带着同情阅读这些理论,发现我们可能在他们的错误的基础上,引导这里的人们认识到更高的真理”^⑤。随着《华西教会新闻》被传教士所属差会的国内支持者阅读时,这种使命感也有可能帮助差会获取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支持。

无论如何,这些叙述和研究,尽管有观点偏颇之嫌,但随着《华西教会新闻》在中国国内和海外的发行,确实为当时的传教士和西方人认识和理解中国西南宗教状况和民间信仰起到一定的桥梁和媒介作用。传教士的这些论述为我们今日研究中国西南宗教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责任编辑:东月)

- ① 陈建明:《〈华西教会新闻〉在中国区域史、传教史研究中的价值》,吴义雄编:《地方社会文化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7页。
- ② C. L. Foster, "Notes on Mt. Omei Rout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26, No. 4, (1924), pp. 15-21.
- ③ B. Bassett, "The Big Buddha at Kiating",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42, No. 6, (1940), p. 285.
- ④ "The Great Dragon of the Golden Summit",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6, No. 10, (1904), pp. 206-208.
- ⑤ A. F. Lutley, "The Special Meetings at the Wen Shu Wan",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33, No. 7-8, (1931), pp. 9-12.
- ⑥ "The Buddhist Ordination Ceremony",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36, No. 5, 1934, pp. 4-8.
- ⑦ R. C., "Tibetan Prayers, Priests and pilgrimages",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14, No. 11-12, (1912), pp. 9-13.
- ⑧ Tibetan (Robert Cunningham), "The Lama",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25, No. 10, (1923), pp. 20-23.
- ⑨ Tibetan (Robert Cunningham), "The Back Door",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41, No. 11, (1939), pp. 416-419.
- ⑩ J. H. Edgar, "Convents and Nuns in Tibet",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31, No. 12, (1929), pp. 18-22.
- ⑪ J. H. Edgar, "Anthropolatry: Buddhas and Buddhisattwas",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25, No. 4, (1923), pp. 27-29.
- ⑫ J. H. Edgar, "Lamaism",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39, No. 5, (1937), pp. 1-2.
- ⑬ N. H. Bare, "Rain Production of the Tibetan Border",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33, No. 10, (1931), pp. 14-15.
- ⑭ N. P. Hardy, "Tibetan Customs in Sickness and Death",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25, No. 10, (1923), pp. 5-7.
- ⑮ Tibetan (Robert Cunningham), "The Back Door",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41, No. 11, (1939), pp. 416-445.
- ⑯ M. K. N., "The Value of Medical Work as A Means of Reaching the Tibetans",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12, No. 10, (1910), pp. 16-19.
- ⑰ J. Vale, "Divination, Fortune Telling, and the Art of the Startler",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12, No. 8, (1910), pp. 17-19; Vol. 12, No. 9, (1910), pp. 20-23; Vol. 12, No. 10, (1910), pp. 26-28; Vol. 12, No. 11, (1910), pp. 31-32; Vol. 12, No. 12, (1910), pp. 28-29; Vol. 13, No. 1, (1911), pp. 29-32; Vol. 13, No. 2, (1911), pp. 27-29; Vol. 13, No. 3, (1911), pp. 28-30; Vol. 13, No. 4, (1911), pp. 19-21.
- ⑱ J. Vale, "The Art of the Startler",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15, No. 8, (1913), pp. 18-20; Vol. 16, No. 2, (1914), pp. 28-30; Vol. 16, No. 3, (1914), pp. 28-30.
- ⑲ J. Vale, "Chiang Tsi Ya, the Father of the Gods",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13, No. 2, (1911), p. 30.
- ⑳ J. Val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nd the Worship of the Queen of Heaven",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7, No. 4, (1905), pp. 70-74.
- ㉑ T. Windsor, "A Curious Phenomenon",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7, No. 10, (1905), pp. 204-205.
- ㉒ O. L. Kilborn, "Editorial",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9, No. 6, (1907), pp. 2-3.
- ㉓ L. G. Kilborn, "Whosoever Loses His Life Shall Save It",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41, No. 6, (1939), pp. 275-279.
- ㉔ J. Taylor, "Editorial",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Vol. 17, No. 4, (1915), pp. 2-3.